

新思维论丛

20
世纪

“另类”

钟名诚 / 著

批评话语

朱光潜研究新视阈

20SHIJILINGLEIPIPINGHUAYU

ZHUGUANGQIAN

YANJIU

XINSHIYU

中国文联出版社

20 世纪“另类”批评话语

朱光潜研究新视阈

20SHI JILINGLEIPIPINGHUAYU

ZHUGUANGQIAN

YANJIUXINSHIYU

钟名诚 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20世纪“另类”批评话语：朱光潜研究新视阈 / 钟名诚著. — 北京：

中国文联出版社，2004.6

(新思维论丛·1-3 / 钟名诚主编)

ISBN 7-5059-4573-4

I. 2… II. 钟… III. 当代文学—文学评论—中国—文集

IV. I206.7-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43536 号

书 名	新思维论丛 (1-3)
主 编	钟名诚
出 版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 行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行部 (010-65389152)
地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100026)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	李金玉
责任印制	李寒江
印 刷	北京隆昌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50 × 1168 1/32
字 数	1020 千字
印 张	34.25
插 页	6 页
版 次	2004 年 6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5059-4573-4/I · 3565
总 定 价	68.00 元 本册 15 元

您若想详细了解我社的出版物

请登陆我社的网站 <http://www.CFLACP.com>

本书为 2003 年度江苏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成果
编号：03SJD750004

前 言

朱光潜的一生是热闹的，也是寂寞的。热闹是因为他的理论一直都是文艺界争论的对象，从20世纪的30年代到80年代，每当我国文艺处于某种转折时期，朱光潜的理论往往都能成为争论的焦点，当然更多的时候是作为批评的靶子。然而他仍然是寂寞的，因为他所建构的美学理论、文艺理论等一直都处于主流的边缘。相对于每一时期“熙熙攘攘”的主流理论来说，他只能是寂寞的。他始终默默地、站在时代主流的边缘观照中国现代文艺的发展，以他中西贯通的学术修养，默默地建构更具有文艺本体意识、更符合中国文艺现实的美学理论和文艺理论。因此，他的理论是非主流的，是带有“另类”色彩的，是一种“另类”话语。正如钱念孙所说：“当时代需要政治力量去改变现实时，他却要用谈美的方式去洗刷人心；当时代要调动一切因素服务于眼前的实际利益时，他却说文艺要超越这种功利而保持自身的价值。”

本书的目的就在于探讨朱光潜独具“另类”特色的文艺批评理论及其当代意义。所谓“另类”是指游离于主流、传统之外的意思。朱光潜的“另类”批评话语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补苴罅漏”，这种“补苴罅漏”是在其中西交往的基

础上努力建构的既具备世界文艺视野、又具备中国文艺背景的、却游离于时代主流话语的文艺本体论批评话语。

朱光潜的文艺批评思想主要体现在其前期论著中。20世纪30—40年代是中国现代文学取得长足发展的年代，也是社会政局激荡不安的年代，文艺在这样的年代里找到了最好的土壤，文艺为政治服务的“载道”价值也得以充分的体现。但朱光潜却提出了与时代潮流格格不入的“无所为而为”的“另类”文艺批评观；当主流批评——社会历史批评方法盛行的时候，朱光潜却提出了“创造的批评”，主张批评一首诗就是创造一首诗，强调批评家的批评本质上就是一种重新创造；当人们强调批评主体的政治思想修养时，他却提出批评主体重在修养“趣味”；当新诗人们主张废弃束缚情感自由发挥的诗歌音律时，他又认为诗歌应该是“具有音律的纯文学”；当人们强调语言的工具性时，他却把语言当作一种本体，提出“言意同一”的观念；……，凡此种种话语，均有与当时主流批评话语“背道而驰”的嫌疑，这就是朱光潜的“另类”文艺批评观。

从20世纪末到21世纪的今天，在文艺批评这一方净土上，充斥着种种浮躁之声，不是翻版西方批评理论就是拿出祖宗先辈挾伐一通。贩卖和谩骂就成了世纪之交文艺批评领域两道“亮丽而闹热的风景”。

“亮丽”也罢，“闹热”也好，均无益于文艺批评理论的建设，理论的研究还是需要寂寞的品格。从这一点上看，我们似乎可以从朱光潜的研究风格中获取某些启示吧。

目 录

前 言	(1)
第一章 “无所为而为” ——前期批评观	(1)
第二章 “主观和客观的统一” ——后期批评观	(21)
第三章 “纯正的批评趣味” ——批评主体修养观	(58)
第四章 “创造的批评” ——批评方法观	(75)
第五章 “言意同一” ——语言批评观	(93)
第六章 “一切价值都由比较得来” ——比较诗学观	(111)
第七章 “诗是具有音律的纯文学” ——诗歌批评观	(134)
第八章 “真正的好的批评家永远是书评家” ——书评观	(175)

第九章	“吐肚子直书”	
	——散文批评观	(195)
第十章	“宽大自由而严肃”	
	——刊物批评观	(215)
第十一章	“心口如一”	
	——写作观	(235)
第十二章	“欧化与文言兼取”	
	——语文建设观	(256)
后 记		(270)

第一章 “无所为而为”

——前期批评观

我们知道，朱光潜文艺批评观的发展演变大体分为前后两个时期，以 1949 年新中国成立为界，之前的文艺批评观我们称其为前期批评观，之后的文艺批评观我们称之为后期批评观，这一分期已得到学界的公认，勿需赘述。本章所要讨论的就是朱光潜建立在中西对话基础之上所建构的“无所为而为”的前期文艺批评观。

一、东西方治学经历

所谓文艺批评观是指一个文艺批评家批评理论建构和批评实践的总的指导思想。一个文艺家的创作道路和创作思想大半要受其生活道路与人生观的影响。同样的道理，一个文艺批评家的批评观在很大程度上往往也要受到其人生阅历和人生哲学的影响。因此，朱光潜前期文艺批评观的建构也首先与他的人生经历和所信奉的人生哲学有直接的关系。

1897 年 9 月 19 日，朱光潜诞生在我国著名的古文之乡——安徽桐城县。小学时期他并没有受过学校教育，完全是

在其父亲——一个乡村私塾教师的严格要求下，接受封建私塾教育，而且由于私塾的教学方法多注重记忆，所以他对中国古代经典大多烂熟于心。当时他所接触的多为中国古代经典：儒、道、佛文化，其中的儒家思想和老庄哲学思想深深渗透于其幼小的心灵，为其以后建构“无所为而为”的文艺批评观打下了坚实的中国传统文化基础。朱光潜在他的《自传》中说，他从四岁开始到十四岁，“读过而且大半背诵过四书五经、《古文观止》和《唐诗三百首》，看过《史记》和《通鉴辑览》”等中国古代文化经典，并且经受过我国古代科举应试教育的严格训练，特别是对科举八股文进行过系统练习。据朱光潜自己说，他能写一手漂亮的八股文，准备遵循其父辈们的安排走科举取仕之路。只是由于时代的变迁，朱光潜的这般优势没能得到发挥，但却在无意中为其日后建构具备中西交往特色、具有“另类”话语特征的文艺批评理论奠定了厚实的中国文化基础。当然，在其八股文训练过程中，朱光潜并没有仅仅满足于科举考试方面的内容，而是广泛阅读不同流派的作品，也广泛阅读当时在正统文人眼中的正统或非正统的书籍，既学习四书五经、八股范文，也阅读《饮冰室文集》等“闲书”。这些阅读得益于其父辈们的宽容，才使得他能够如此广泛涉猎除科举八股之外的其它中国古代优秀传统文化，这样的阅读经历对造就其“另类”性质的批评思维具有不可低估的作用。进入该上中学的年龄段以后，朱光潜已经不再满足于私塾教育的狭窄视野，迫切地需要扩充自己的知识视野，因而进入了古文家吴汝纶创办的以古文教育著称的桐城中学，教学所用的教本就是姚鼐编写的

著名的《古文辞类纂》。从私塾到中学毕业，经过十几年的古文磨练，朱光潜实际上已经基本掌握了中华古代经典的文化内涵，对中国古代经典的艺术精髓已经有了自己的独到领悟，感悟到了中国文化经典的实质。这段并不短暂的古文教育经历为其以后建构具有中西交往特征的“另类”文艺批评理论烙上了深厚的中国底色。

历史总是垂青勤奋的人。1916年朱光潜中学毕业以后，本想报考北京大学，但由于经济方面的原因只能选择不收学费的武昌高等师范学校中文系。这所学校并不是朱光潜心目中理想的学校，朱光潜觉得在这里并没有学到多少东西，除了学校的学术风气不正之外，老师的水平甚至还比不上桐城中学。正在朱光潜心灰意懒之时，却意外地有了一次接受西洋教育的机会，这次留学机会直接影响了朱光潜以后的学术道路。当时北洋政府为了振兴中国教育，从全国的高等师范学校中选拔了一批学生到香港大学去学习教育，朱光潜很幸运地考取了。从此，他从完全的国学经典中跳了出来，开始接受西方现代学术思想。可以说香港留学的机会改变了朱光潜的学术眼光，也决定了他以后的学术研究方向。他在《自传》中说，香港大学学习的内容“奠定了我这一生教育活动和学术活动的方向”。这是朱光潜第一次接触、接受西方教育，也第一次打开了西方文化的大门，可以说，这次留学香港是他中西学术交往的起始点。香港大学毕业以后，朱光潜回到了内地，主要工作是做中学教员，从中了解中国的基础教育，对中国的基础教育状况有了一定的体会，但这段工作经历并不长，前后只有4年的时间。

1925年夏天，他又考取了安徽的官费留学生资格，从此在欧洲过上了十几年的留学生活，广泛地涉猎西方各种文化，大量地吸纳西方的文化艺术精髓，为其以后的中西学术交往打下了坚实的西学基础。他先后在英国的爱丁堡大学、伦敦大学，德国的斯特拉斯堡大学，法国的巴黎大学研修文学、哲学、心理学、艺术学等。这些国家的文学艺术成就被公认为是世界最高水准的，朱光潜在这浓厚的文化艺术氛围中，充分地吸收西方文学艺术的精髓，其西方文化及文学艺术的造诣在中国现代学术界可以说是屈指可数的。

这样一种中西兼备的人生经历与治学经历，为朱光潜日后建构具有中西交往对话意味的“另类”文艺批评观打下了坚实的基石。

二、“以出世的精神，做入世的事业”

一个人的人生经历、生活道路以及治学经历往往是其人生观形成的基础。朱光潜在其独特的经历中，也孕育了他与众不同的人生哲学和人生理想。

朱光潜曾经在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写过一篇著名的检讨——《我的文艺思想的反动性》，文中谈到了他早年的人生观和人生哲学。他说：“我自六岁识字起，一直受了将近十年的私塾的封建教育。进了学校以后，我也还是不断地读线装书。”“在悠久的中国文化优良传统里，我特别爱好而且给我影响最深的书籍，不外《庄子》、《陶渊明集》和《世说新语》这三部书以及和它们有些类似的书籍。”这些书籍使

他“逐渐形成所谓‘魏晋人’的人格理想。根据这个‘理想’，一个人是应该‘超然物表’、‘恬淡自守’、‘清虚无为’，独享静观与玄想乐趣的。”这样一种人生哲学，形成了朱光潜与众不同的对人生、对生活、对文艺的观念。后来朱光潜在《悼夏孟刚》一文中，正式用两句话概括了出来——“以出世的精神，做入世的事业。”这种人生观伴随着朱光潜生活道路和学术道路的始终，致使他的文艺理想和美学理想在20世纪初、乃至20世纪后期都与当时的主流文艺观和美学观产生了一定的隔阂，成了一种带有“另类”性质的文艺观念和美学观念。正因为如此，他的文艺观和美学观也就常常成了不同时代的批判对象。

朱光潜这种具有“魏晋人”人格理想的人生观还使他在欧洲留学期间所选择的学术研究对象也与众不同。

康德、黑格尔、立普斯、克罗齐等具有自由主义倾向的文学家、哲学家和美学家成了朱光潜追崇的偶像，他们的文艺思想对朱光潜文艺批评观的建构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可以认为，朱光潜1949年之前的文艺批评观就是这些西方学者文艺理想在中国的延续。更有意思的是朱光潜学成回国后，很快就与当时带有自由主义文艺倾向的“京派”文人融合在一起，而且很快成了“京派”文艺批评理论的旗帜人物。

朱光潜具备了这样一种人生经历和人生哲学，也就基本决定了他要走的文艺道路。推崇纯文艺、主张文艺与政治之间的距离感、以出世的精神观照文艺问题的学术道路就成了朱光潜建构其文艺批评观的基本方向。所以，在20世纪30-40年代，他的文艺批评观也就有别于其它文艺流派的主

张，特别是与当时占主流地位的“左翼”批评观产生了根本的对立情绪，因而，他的这种文艺批评观在当时遭到许多批判也就理所当然了。

在有些人的眼里（如 20 世纪 40 年代朱光潜受到了郭沫若、邵荃麟、蔡仪等的批判，当时他们分别写了《斥反动文艺》、《朱光潜的怯懦与凶残》和《朱光潜论》批判朱光潜的文艺思想，其批判的有些言论已经离开了纯粹的学术争论，进而变成了人身攻击，这在朱光潜看来是非常伤心的事情），认为朱光潜的文艺批评理论，强调的是“艺术至上论”，是一种强调文艺的超功利性、超现实性的论调，这种论调是逃避现实态度的体现，因了这个缘故，导致他的文艺批评观和美学观在整个 20 世纪都脱离不了被批判的命运。

那么，他的文艺批评观在本质上是否是这样脱离现实、专注艺术至上的呢？

三、“无所为而为”

如果我们比较深入、比较系统地阅读、探讨朱光潜的有关著述，就会发现，朱光潜在建构他的文艺批评观时并没有忽视文艺的社会功能，甚至反而特别注重文艺与道德、文艺与现实人生的关系。只不过他的文艺批评观的建构由于受到其人生观的影响，不像当时的“左翼”文艺批评那样与现实政治结合得那么紧。我们知道，“左翼”文艺批评主张以文艺与政治的对应关系为中心，标榜文艺的政治属性和阶级属性，张扬文艺的社会变革功能，从而将文艺的功能提高到与

政治等上层建筑具有同等作用的地位。在朱光潜看来，这种文艺批评观过分夸大了文艺的社会功用，是不符合文艺本质的观念。因此，他一直反对当时“左翼”的这种文艺论调，这样一来自然就会受到当时占主流话语地位的“左翼”批评家们的批判。

在反对当时“左翼”文艺批评观念的同时，朱光潜主张建构一种“无所为而为”的文艺批评理论，这种文艺批评理论的核心是：要求在文艺活动中，文艺与现实政治保持一定的距离，文艺活动只有跳出各种政治派系的纠缠，才能保持文艺应有的独立品格，才能发挥文艺真正的社会作用，也只有这样才能真正体现出文艺的本体特征。

实际上，早在1923年的时候，朱光潜就已初步提出了建构“无所为而为”的文艺批评理论的想法。他在《消除烦闷与超脱现实》一文中说：“在理论上，吾人生活当是不受理性支配的，因为无意识和感情在那儿潜移默化，意识的防范实在是鞭长不及马腹。”在这里，他将文艺的功能看成是一种超脱现实人生的东西。朱光潜在这里提出的观点可以说是其“无所为而为”文艺批评观的萌芽时期，此时朱光潜虽然还没有明确提出建构“无所为而为”的文艺批评观，但却为他之后建构这种独特的具有“另类”特征的文艺批评观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

到了1932年，朱光潜经历了十几年的欧洲留学生涯后，在与欧洲文艺思想家广泛交往和对话的基础上，对文艺的社会功能作了深入的思考。因此，在《谈美》一书中明确地提出了“无所为而为”的文艺批评观：

美感的世界纯粹是意象世界，超乎利害关系而独立，在创造或是欣赏艺术时，人都是从有利害关系的实用世界搬家到绝无利害关系的理想世界里去。艺术的活动是“无所为而为”的。

“无所为而为”既是我国古代老庄哲学中的一个概念，也是西方自由主义文艺思想中的一个范畴，朱光潜将其借用，在他的文艺批评领域。虽然他本人并没有给它下一个明确的定义，但从朱光潜的论述中，可以概括地认为，“无所为而为”是指在文艺活动中，文艺与现实政治的关系不能过于直白，文艺不直接为政治道德服务，但文艺又不能脱离与现实政治、人生道德的关系，文艺为现实社会的服务是一种无意为之的，是一种“无所为而为”的态度。

四、“无所为而为”与“道德”

1932~1936年间，朱光潜在斯特拉斯堡学习，其间完成了他著名的《文艺心理学》写作。著作完成后作者并没有急于出版，而是不断思考、追求精益求精，努力建构出比较符合文艺真理的观念。因此，回国后先后在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中央艺术学院作为教材使用，并在教学过程中不断“修改和增补”，直到1936年才由开明书店正式出版。

在朱光潜的眼中，“这是一部研究文艺理论的书籍”，“它丢开一切哲学的成见，把文艺的创造和欣赏当作心理的

事实去研究，从事实中归纳的一些可适用于文艺批评的原理”。由此可知，朱光潜的本意是希望建构出一种与众不同的、更具文艺本体意味的批评理论。

在这部著作中，朱光潜具体地阐释、建构了他“无所而为”的文艺批评观。

在书中，朱光潜首先考察分析了文艺史上关于文艺和道德关系的种种观点。^①认为文艺史上关于文艺与道德的关系是非常复杂的一种情况，文艺附庸于道德的情况我们也不能一概给予否定，在文艺的发展史中，有时道德对文艺的发展并不是完全没有益处的。

以历史的观点看，中国文艺史上关于文艺与道德的紧密关系问题自周秦时代开始，一直到现代西方文艺思潮的传入为止，“文艺都被认为是道德的附庸”，但中国的文艺并没有因此就落后于西方。文艺附庸于道德是中国国民性的表现，因为中华民族向来偏重于“实用”，而文艺的实用价值就表现在用文艺来加载道德。道德是实用的，文艺只是道德宣传的一种载体，这就是中国国民性的特征。当然在文艺的表现手法上，中国文艺同样也重视艺术性，重视文艺的艺术价值，但追求这种艺术价值的目的也是为了使文艺更好地“载道”，“文以载道”就成了历代中国文艺家追求的目标，也成了评价中国文艺价值的重要标准，因而也就成了中国文艺的

^① 在朱光潜的论著中，“道德”一词意思就是政治。朱光潜在其《文艺心理学》一书第八章的作者补注中说：“讨论文艺与道德关系的七、八两章，是在北洋军阀和国民党专制时代写的，其中‘道德’实际上就是指‘政治’”。